

# 退出农业的村庄缘何重返农业?

## ——河南省干河陈村的城镇化与农业发展案例

何安华,倪坤晓

(农业农村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北京 100810)

**[摘要]** 文章基于河南省漯河市干河陈村城镇化和农业取舍的图景描绘,考察了村庄城镇化和农业发展的关系,认为两者在此消彼长的动态演变中走向和谐共融的新均衡。现代农业和传统农业有着本质的差异,村庄对农业的取舍归因于农业发展形态能否与村庄城镇化相适应。不同发展阶段的农业在村庄变迁中更多扮演着“服务者”角色和承担“服务”的功能。要素市场和产品市场的发育决定了村庄在城镇化过程中能否顺利地退出或进入农业。基于案例分析,得出三点启示:应辩证看待农业产业弱质性和弱潜力,村庄发展中的资源利用要紧跟时代需要,应从村庄发展的角度重新理解城镇化。

**[关键词]** 农村城镇化;农业发展;要素市场;产品市场

**[中图分类号]** F299.21,F3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6973(2022)03-0017-08

### 一、提出问题

在快速城镇化进程中,“乡土中国”向“城乡中国”转型,中国的村庄在社会治理、社会结构、社会价值等方面发生着史无前例的历史变迁<sup>[1]</sup>。在现代化进程中,城的比例上升和乡的比例下降是客观规律<sup>[2]</sup>,村庄数量随着城镇化推进而减少是一种普遍现象。据统计,2000—2018年中国的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从36.22%提高到59.58%,同期村民委员会数量从73.5万个减少到54.2万个,减少26.09%;自然村数量从353.7万个减少到245.2万个,减少30.67%。典型调查也表明农村人口外流和宅基地闲置的叠加导致了农村空心化,韩纪江基于全国14省44县11个行政村测算出农村空心化严重程度平均为14.4%<sup>[3]</sup>。在统计数据和典型案例的基础上,李培林、田毅鹏和韩丹、李国珍等学者提出了村庄衰落或消亡的观点<sup>[4-6]</sup>。陆益龙却指出中国村庄不会终结,城镇化与农村新发展并行不悖<sup>[7]</sup>。实际上,城镇化会倒逼村庄转型<sup>[8]</sup>,村庄受空间距离和自然条件等因素的影响出现了异质化<sup>[9]</sup>,例如有的村庄通过挖掘和动员乡土资源建立了乡村发展的内生动力机制<sup>[10]</sup>,有的村庄则依靠工业或服务业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并逐渐催生出村庄市场共同体<sup>[11]</sup>。国家政策对村庄发展

**[收稿日期]** 2021-03-10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城镇化进程中村庄的分化机制及振兴路径研究”(20CJY033)。

**[作者简介]** 何安华(1985—),男,广东佛山人,博士,农业农村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副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城镇化、农村发展;倪坤晓(1990—),女,河南洛阳人,博士,农业农村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农村发展、集体经济。

的影响也很大,特别是党的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后,村庄迎来了提档升级的新契机。

国内外实践表明,以大村强镇为载体吸纳农民就地城镇化是城镇化的另一条道路。近年来,学界不少文献探讨了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与农业现代化之间的相互关系<sup>[12-16]</sup>,从提出“三化同步”到升级为“四化同步”,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都是最为基础的两个“化”,两者关系演变恰是反映了城镇与乡村、农业与非农业之间的关系变迁。不管城镇化进展到哪一步,农业都要发展,乡村都不会消亡<sup>[2]</sup>。推进农村的城镇化,首先要考虑农业的发展状况<sup>[17]</sup>。随着城镇化的推进,村庄的农业发展方向大体有两个:一是形成“中心—外围”式大区域产业分工,即大村强镇以工商业为主,农业在大村强镇几近消亡,外围村镇通过发展现代农业向大区域提供农产品;二是“小而全”的小区域产业分工,即大村强镇依然保留着农业产业,但农业的发展方式转向高效农业和生态农业。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村庄的城镇化转型和农业现代化可能是在互为制约和互为促进之间交替出现。

在中国的城镇化进程中,发展起来的“千万元村”甚至“亿元村”已不再鲜见,对“超级村庄”自然城镇化过程的观察开启了村庄城镇化研究<sup>[18-19]</sup>。村企关系成为近期农村发展研究的热点<sup>[20-22]</sup>,但关于村庄城镇化与农业发展的关系仍需进一步深入探讨。河南省漯河市干河陈村是全国百强村,该村在1998年确立了“退出一产、优化二产、大力发展三产”的发展思路,农业在村庄的城镇化建设中逐渐消失。但令人意外的是,2016年干河陈村在全村村民实现城镇化的背景下又重新走上了发展农业的道路,将农业定位成村庄经济发展的新增长点。如果将村庄人口城镇化水平和农业发展结合起来考察,那么干河陈村的城镇化和农业是否具有某种规律或发展规则?一个中原农业大省的传统村庄对农业先“舍”后“取”的深层次原因又是什么?探讨前述问题有助于深化对村庄兴衰和区域农业存亡的理解及解析,也有助于为回答“振兴哪些村庄,怎么振兴”问题提供方案。基于此,本文将重点探讨干河陈村的城镇化和农业发展之间的关系,试图回答“退出农业的村庄缘何重返农业”问题,以期为村庄演变、农业转型发展提供有益借鉴。

## 二、案例描述:干河陈村的城镇化建设与农业“取舍”

干河陈村位于河南省漯河市源汇区的西南部,曾是以种植粮食作物为主的传统农业村庄。1990年以后,由于市区向外拓展,干河陈村逐渐被工厂、机关、学校等包围,如今已成为城中村。1998年以来,干河陈村在“政府不投入、村民<sup>①</sup>不花钱”的情况下,凭借临近市区的优势,因城而动、依城兴产,以村庄公司化的方式,依靠自身力量快速推进城镇化改造,走出了一条城郊农村城镇化发展道路,完成了由“村”到“城”的转变,而村庄的农业在不同阶段的功能和定位也各不相同。

### (一)村庄的自然城镇化和农业“统一分”经营

在1949年到1998年的近50年时间里,干河陈村的城镇化是缓慢、低速的自然城镇化过程,集中体现在耕地面积、人口数量、劳动力结构等三个方面的变化。其中:(1)耕地“非农化”占用增加。1949年时干河陈村有耕地2708亩,到了1958年,因修建炼焦厂和漯午铁路、加宽漯午公路、原西大路改道等占用耕地,干河陈村减少耕地148亩。1966年全村开展耕地普查,实有耕地2560亩。随着漯河市区向外延展,1974—1998年期间,干河陈村先后有21宗共计1278.56亩耕地被占用。(2)人口从“户增人增”转向“户增人减”。干河陈村在1950年有213户、1168人,至1957年增加到1500

<sup>①</sup> 文中所说干河陈村的“村民”,特指该村有土地承包权和宅基地使用权的村民,即被确认为干河陈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村民。

多人。妇女保健条件和医疗水平持续提高后,全村人口数量快速增长,到了1976年共有368户、2371人,人口数量比1950年翻了一番。1976—1991年,由于干河陈村的生活条件要比周边农村好,村中已婚女子户口不迁出并让孩子随母落户、招婿上门等现象涌现,全村人口净增637人,达到615户、3008人。1991—1998年,干河陈村出现了户增人减现象,农户家庭数量从615户上升到912户,人口却从3008人减少为2346人,主要原因是被占地农民市民化和部分干部、军人的家属转为城市人口。(3)劳动力持续向非农产业转移。1951年干河陈村有劳动力554人且大部分都从事农业生产,到1966年,该村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是706人,占全村劳动力总量的77.1%。1974—1982年,村里的青壮年陆续进厂务工,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所占比例到1982年已下降至63.4%。此后,由于耕地大量减少,剩余劳动力不断向工业、运输装卸、作坊、饮食服务等行业转移,到1995年前后,全村1708个劳动力中只剩525人从事农业生产,所占比例为30.5%。在这一阶段,干河陈村的变迁与折晓叶提出的村庄自然城镇化过程相类似,即人口聚集和居民职业以非农为主<sup>[19]</sup>。

从村庄农业发展的角度看,1949年至1998年期间,干河陈村的农业发展轨迹与国内多数村庄大体相似。1952年底,干河陈村组织村民走互助合作道路,随后历经互助组、初级农业合作社和高级农业合作社,农业生产水平不断提高。1983年,该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土地按人口平均分配到户,每户交够国家公粮和定购粮后,剩余粮食归家庭所有。家庭分散经营极大地激发了农民的农业生产积极性,村庄的农业发展成效非常明显。农业总产值从1966年的92万多元一路猛增至1993年的1.1亿元,粮食总产量从1966年的432吨增加到1998年的556吨,其中夏粮种植小麦702亩,总产量约248吨;秋粮种植玉米682亩,总产量约308吨。在这一阶段,干河陈村主要种植粮食作物,但蔬菜等经济作物和畜禽水产养殖业均有零星发展。改革开放后,干河陈村紧紧抓住乡镇企业异军突起的契机,在村里先后兴办了曙光面粉厂、搬运队、木材加工厂、医疗器械厂、建材厂等20多家村集体企业。这些村属企业大多持续经营到2000年前后,虽然企业规模总体偏小,但微薄的利润却为村级集体经济发展壮大奠定了坚实基础。纵观干河陈村的农业变迁,其经营方式由“统”转“分”的演变历程跟广大农村是同步进行的。直到1998年9月,干河陈村下发了“关于土地统一管理的规定”,全村土地在当年玉米秋收后收归村委会统一管理,农业在村域范围内即将退出历史舞台。

## (二)村庄“无农业”时代的快速城镇化

1999年至2015年期间,干河陈村有两个具有典型性的变化:一是村庄进入了“无农业”时代,通过土地非农化发展第二三产业来推进村庄工业化和城镇化,在集体土地上“长出了”城镇<sup>[23]</sup>;二是人口快速城镇化,村民生活的地方仍是行政村建制,但他们的生产生活方式逐渐跟城镇居民趋同,即“村里人像城里人那样工作和生活”。这一阶段,干河陈村的城镇化建设呈现出如下四个特征。

第一,村民告别了农业,向二三产业转移,完成职业转型。1999年初,干河陈村将土地收归村委会统一管理,通过土地商品化和资本化去发展房地产,把土地级差收益留给村集体。也是在这一年,干河陈村的全体村民都脱离了农业。为解决村民的就业问题,村办企业开源集团依托旗下房地产、物业、商业、旅游、酒店、餐饮、园林等产业的劳动力吸纳优势,优先录用愿意到村属企业工作的村民,承诺提供合适岗位,同时设立创业基金,鼓励村民自主创业。至2015年底,干河陈村约有2/3的村民在开源集团下属企业就业,占开源集团员工总数的1/5,另有300多名村民自主创业。

第二,拆农房,住楼房,村民的居住条件向城镇居民看齐。干河陈村的城镇化是农民自主的城镇化,即在不改变土地集体所有制性质的前提下将土地用于企业发展和村庄改造<sup>[23]</sup>。2000年5月,干河陈村对134户村民和漯河市食品公司54户员工的旧房实施拆迁,开工建设“安居一区”6幢共140套村民住宅楼,拉开了城中村改造的序幕。到2005年底,村里累计投资3亿元,拆迁670户村民住房,开发建成了森林庄园、香樟花园、菊苑等7个住宅小区,共78栋住宅楼,约65%的村民搬入新楼房居住。到2008年底,该村87.6%的村民住进楼房,人均住宅面积为41.6平方米。在随后的两年里,剩余的村民陆续搬进楼房。楼房内自来水、燃气、有线电视、通讯网络等一应俱全,小区内更有优良的物业服务体系,村庄治理向社区治理转型。

第三,村庄的公共服务日益完善。2000年以后,干河陈村大力投资基础设施建设,生活设施配套水平逐渐超越城区。到2006年,干河陈村的城中村改造向纵深发展,实现了水、电、气等公共基础设施全域覆盖,配套建设了学校、医院等。社区管理方面,积极探索建设和管理相结合的长效机制,推行精细化管理,如成立了社区治安小组、巡防小组等,全方位监控社区,增强了社区居民的安全感和幸福感。在这十余年里,干河陈村先后投资建设了神州鸟园、连锁超市、花卉市场、酒店民宿、博物馆和淘宝街、婚博街、中华名吃休闲街、宝石街等“特色街”,形成了以“商、文、旅、游、购、娱”为业态定位的特色商业区。村民生活在多元业态互通的村庄,不同层次的消费需求几乎都能得到有效满足。

第四,村民的社会保障全面覆盖。一是医疗保障。自2006年起,干河陈村为村民统一购买“新农合”保险,规定50岁以上的村民因病住院后的费用先按“新农合”保险规定报销,余下部分由开源集团全额报销,实现了村民病有所医和看病不花钱。二是生活保障。干河陈村在1994年就开始探索村民退休供养制度,60周岁以上的村民按月从村集体领取生活补助费。随着村集体经济实力的持续增强,村民领取的生活补助费从1994年每人每月20元提高至1996年的每人每月80元。1999年,村民领取生活补助费的年龄门槛降低到50周岁,补助标准是每人每月80~100元,到2005年提高到每人每月136~156元。2006年,干河陈村实施村集体资产产权制度改革,将集体土地在内的全部村级资产入股开源集团,开源集团按11%的年利率对全体村民分红。2009年,开源集团继续深化股权改革,以50周岁为界对村民进行福利分红,其中50周岁以上的村民被纳入开源集团内部退休员工序列,按月领取退养金;50周岁以下的村民成为开源集团的自然人股东,年终按股分红,到50周岁后自动转为内部退休员工。2015年,干河陈村的中青年村民每人分红6000元,50岁、60岁、70岁以上的村民每人每月分别领取退养金1600元、1800元和2000元。此外,干河陈村对残疾人给予特殊照顾,让残疾人按照60周岁村民的待遇领取退养金。这种生活保障机制使干河陈村的村民得以老有所养和困有所帮。

### (三)全民城镇化呼唤村庄发展现代农业

2010年以后,干河陈村的村民已经全部住进楼房,他们的生产生活方式跟城镇居民几乎没有差别。进入全民城镇化阶段后,干河陈村的城镇化建设具有三个基本特征:第一,村域面积不断扩大,从1998年时不足1平方公里扩大到2016年的近3平方公里,带动漯河市区向南扩展6平方公里。第二,村庄人口进一步集聚,“土著”村民少而外来居民多。2008—2016年,居住在干河陈村的人口从941户3461人增加到9000余户35000多人。截至2016年底,干河陈村的村民约为3500人,而社区新居民约为32000人,也就是说,干河陈村的村民实际上已经成为了村域内的少数人群

体。第三,村庄配套设施的旅游化倾向明显。维持村庄的兴盛状态需要依靠客流和物流来保持村庄经济繁荣。兴建和完善乡村旅游配套设施就是一个有效途径。2016年,干河陈村把项目带动作为促进文化旅游产业提档升级的战略性举措,加快开发零售业、住宿餐饮业、文化旅游业等项目。通过兼并邻近村落取得发展用地,干河陈村建设了未来城市购物中心、生态步行天街、中国农村特色展品展示中心等,使村域片区成为豫中南最大的休闲购物城,同时打造中国知名的中原民俗文化旅游小镇,完成包括100种名优小吃、100个民俗作坊、100类特色旅游产品在内的“三个100工程”。目前,旅游和服务业已经成为干河陈村的主要经济支柱,村庄的地理边界、交往边界、经济边界、行政边界都在不同程度地扩展,村庄市场共同体逐渐形成<sup>[11]</sup>。

随着村庄人口持续集聚,各类市场要素迅速向村庄渗透,干河陈村抓住旅游服务业兴起的机遇实现了跨越式发展。据《全国乡村旅游发展监测报告(2019年上半年)》数据显示,2019年上半年全国乡村旅游总人次达15.1亿次,总收入为8600亿元,带动就业886万人。在乡村旅游热潮中,提供安全高质农产品和生态休闲乡村风光成为村庄吸引客流和物流的重要方式。正因如此,现代农业被视为新阶段村庄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干河陈村在实现全民城镇化后做出了进军现代农业的战略决策。城镇化建设让干河陈村的集体土地长出了商业服务业和城镇社区,村域内已经没有农业用地,因而该村发展现代农业就只能依靠外部土地资源,在村外租赁土地发展“飞地”农业。

实际上,干河陈村虽然没有了耕地资源和传统农业,但村“两委”班子和村民始终关注农业。2012年,干河陈村组建团队专门收集和 research 现代农业信息。2014年,干河陈村初步形成了现代农业与开源集团旗下产业互为支撑、促进产业融合发展,为全市居民提供生态、健康食品,进一步提升村庄品牌形象和影响力的发展思路。2016年,干河陈村开工建设规划面积约15000亩的三河湾生态观光农业园。该农业园位于漯河市的城乡一体化示范区内,距离漯河市区约8公里,因地、因景设计出“三区、三带、三岛”空间结构,以生态循环农业为基础,拓展“农业+文化”“农业+旅游”“农业+养老”“农业+会务”“农业+餐饮”“农业+科技”等多元化业态,力求实现农业的功能、景观和生态平衡,促进村庄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发展。

### 三、案例分析:农业功能转换与市场作用

干河陈村的城镇化建设在不同阶段有着不同的农业取舍选择,在1999年拉开快速城镇化序幕时成功地退出了农业,到2016年又成功地重返农业。那么,干河陈村为什么要退出农业?为什么要重返农业?又为什么能自由退出或重返农业?这些问题值得深入探讨。

#### (一)村庄城镇化建设与农业功能转换

第一,农业发展形态与农业功能转换。从时间上看,农业在不同发展阶段的形态是不断变迁的,发展脉络是从生活自给型传统农业走向服务增值型现代农业。农业功能、农业价值和农业组织共同塑造了农业形态<sup>[24]</sup>,而不同的农业形态有着不同的农业功能。从功能上看,传统农业主要是食物保障和就业保障功能,而现代农业除了这两个基础功能外,还随着城乡居民日益增长的休闲需求而逐步向生态涵养、观光休闲、文化传承等多功能拓展,因而现代农业的价值量远高于传统农业的价值量。从成本收益看,传统农业的比较收益较低,农地非农用空间小,退出传统农业的机会成本小于潜在收益。而现代农业契合政策支持方向,现代农业项目中通常有一定比例的土地可用于配套设施建设,其开发利用能规避农地农用的限制,以“农”之名行与“农”沾边的“半农”或“非农”之

实,使得发展现代农业的潜在利润大于机会成本。干河陈村在其城镇化建设的不同阶段对农业功能的需求是不同的,也正因为如此,村庄对农业有着“舍”和“取”的不同选择。村庄农业的命运在于农业发展形态、农业功能、农业价值能否与村庄的城镇化建设相适应。

第二,村庄退出传统农业和获取农业“要素功能”。从土地资本化的方式看,干河陈村走的是刘守英所说的农民自主的城镇化模式<sup>[23]</sup>,亦或者是折晓叶界定的自然城镇化模式<sup>[19]</sup>。这种模式下的城镇化主要是依靠“内源”动力,推进村庄城镇化建设的资源要素和原始积累来源于村庄内部,产生的要素收益也保留在村庄内部。尤其是土地的非农使用以村庄为边界,自然城镇化过程属于自生自灭,成功则能突破地方城镇化格局获得超前发展,失败则萎缩、破产和解体<sup>[18]</sup>。土地是农业发展的要素,也是村庄城镇化建设的要素。伴随农业社会向市民社会转变,土地成为升值最快、最稳定的要素<sup>[23]</sup>,一旦某片土地具备非农使用的可能性,那它就会被积极地拉向城镇化建设。20世纪90年代后期,干河陈村就遇到了城区外扩、城镇化改造的契机。在干河陈村的城镇化建设初期和中期,村庄农业的要素功能对城镇化的贡献更大,或者说是更适应当时村庄城镇化的需求,因而干河陈村退出农业并将土地、资金、劳动力等要素用于企业发展和城镇化建设。

第三,村庄进入现代农业和获取农业“产品功能”。随着城乡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优质农产品和富有特色的乡村农旅风光的市场需求日益旺盛,现代农业逐渐成为旅游型村庄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点。干河陈村的集体经济产业体系以房地产业为支撑,还包括旅游业、商业、物业、餐饮业等,重返农业是其打造全封闭产业链的最后环节。村庄建设自有的农业生产基地,生产出来的安全高质农产品直接供应给村属餐饮公司,一方面减少了农产品采购环节的利润流失,实现“外部利润内部化”;另一方面有利于塑造生态餐饮品牌,吸引更多游客前来消费。自有基地生产的农产品直接输送到村属物业公司所服务的社区和超市,甚至通过农产品“定制化”供给,既解决了基地农产品的销售问题,又为村庄居民提供了生活便利,增强了村庄集聚人口的“拉力”。通过在农业生产基地发展休闲农业、体验农业等,以“农业+商业+物业+餐饮+旅游”模式推进五大产业相互支撑,开展多元化经营,这是干河陈村分散产业风险的理性选择。另外,各级政府制定了支持现代农业发展的优惠政策,干河陈村重返农业就能够有机会获取政策红利。因此,干河陈村在其城镇化水平达到较高程度后,重返农业是其分散风险和培育发展新动能的现实需要。

## (二)村庄进出农业与市场作用

干河陈村在城镇化的不同阶段,由退出传统农业转变为进入现代农业,这是市场配置生产要素和农业产品的结果。

第一,要素市场发育为退出传统农业的生产要素提供了“销地”,为进入现代农业所需的生产要素提供了“产地”。退出一个产业,产业内的土地、资金、劳动力甚至技术等生产要素需要重新配置,这些要素的出路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产业转型的成败,需要给它们提供一个流动的平台。同样,当一个没有耕地资源的村庄或公司要进入现代农业领域,其发展现代农业的各类要素也需要有平台去支撑。1999年干河陈村退出传统农业时,村里的土地收归村集体统一经营,村集体通过计价折股和村办企业提供生活补助的方式为村民提供土地转化收益,实现了土地的“退出”;通过培训和优先招录本村青壮年进入村办企业就业的方式,解决了农业劳动力的非农化“退出”;通过自然人资金入股开源集团的方式,为村民将闲置资金从农业领域转向非农业领域的投资提供平台,实现了资金的“退出”。2016年干河陈村重返农业时,要素市场已进一步发育,要素流动平台完全由市场承担,即

干河陈村重返农业所需要的各类生产要素都可以通过市场渠道得以满足。一是土地要素可通过土地流转市场获取。例如,干河陈村通过地方政府规模流转土地,以长期租赁方式获得 15000 亩土地 12 年的经营权,土地租赁到期后可在同等条件下拥有优先续租权。二是资金要素既可来源于村属企业的经营积累,又可通过外部融资方式获得补充。三是农业劳动力、农业技术人员等都可以在劳动力市场上直接招聘。换言之,要素市场发育降低了干河陈村退出农业和进入农业的壁垒。

第二,产品市场发育为退出传统农业发挥了“稳定器”作用,为进入现代农业提供了产品“出路”。传统农业主要解决了农民自我雇佣和家庭食物自我供给问题,而现代农业主要是对外输出农产品,农产品商品化水平较高,对区域食物供给和食物质量安全起到一定的保障作用。退出传统农业和进入现代农业都与农产品市场化程度密切相关。村民集体退出传统农业的食物保障需要通过市场去解决。例如干河陈村将土地收归村集体统一经营后,在一段时期内通过村办面粉厂向村民统一发放面粉,每人每月 15 公斤,解决了村民的“口粮”供给问题,这一举措有效降低了村民退出农业的难度。当干河陈村进入现代农业后,其生产的农产品出路由市场解决,如将农产品销售给村里开发的中华名吃一条街、村办酒店、餐馆、自营超市等,为干河陈村的居民、企业员工、游客甚至漯河市区的居民提供高质量农产品。此外,干河陈村异地发展生态观光农业,将农业的自然生产过程与市场消费过程相结合,使农业的有形产品和无形产品都进入市场创造价值。

#### 四、结论与启示

干河陈村在 1999 年以前的发展路径与国内大多数村庄并无明显差别,但在 1999 年之后实现了由“村”到“城”的转变,70 多年的变迁史展示了农业从有到无、再从无到有的历史,描绘了城郊型村庄的城镇化建设进路。本文回顾了干河陈村 1949 年以来的发展变迁过程,分析了村庄的城镇化建设和农业发展之间的关系,认为两者的关系是动态演变的,即便经历此消彼长却终将走向和谐共融的新均衡状态。具体而言,传统农业和现代农业具有本质差异,但不同发展阶段的农业在村庄的发展变迁中更多是扮演“服务者”角色和承担“服务”功能;当村庄的城镇化建设需要农业发挥要素功能时,传统农业就会走向衰弱直至被“抛弃”;当村庄的城镇化建设需要农业发挥服务增值型产品功能时,现代农业就被村庄所“青睐”甚至被视为村庄新的经济增长点。村庄在城镇化建设过程中能够成功地退出农业或进入农业,这得益于农业生产要素市场和农产品消费市场的资源配置作用。市场是调节村庄城镇化和农业发展的关键力量。当村庄高度城镇化后,农业功能定位会有所改变,这种定位已从过去的食物保障和就业保障转变为优质食物供给和生态休闲消费,这也正是城镇化赋予农业的多功能性,是城镇化和农业发展互相协调、互相促进的时代需要。

干河陈村发展变迁的案例有以下三点启示:第一,应辩证看待农业产业的弱质性和弱潜力。农业存在弱质性已基本成为共识,但农业的功能和定位是会发生变化的。如果农业从第一产业转变为依附于第三产业的产业,其弱质性和弱潜力会随着第三产业的强弱而发生变化。农业只有跟随村庄发展进行调整才有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否则农业很可能会被淘汰。第二,村庄发展中的资源利用要紧跟时代需要。资源的活化和动态开发调整才是资源变为资产、资产转化为财富收入并藏富于民的重要保障。村庄各类农业资源的开发利用要适应国家宏观形势的变化,资源的受重视程度和开发利用方式都应是动态的。干河陈村的每一次产业调整都是紧跟时代需要的,根据市场需求去自发调整资源配置方向。第三,应从村庄发展的角度重新理解城镇化。大村强镇农民的就业和

生活方式都已明显异于传统农业村庄,理解城镇化,应更为关注农民在就业方式及收入来源、生活方式及消费习惯、公共服务供给保障等方面的转变,而非简单的户籍身份和居住场所的改变。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干河陈村代表了商业和旅游服务业类型村庄发展的一种典范,对当下乡村振兴及未来村庄分化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干河陈村的研究也为学界探讨乡村振兴拓宽了视野,即村庄变迁在城镇化进程中不应是衰退、终结、消亡的简单思维,而是不同类型村庄都有着兴起和兴盛的多元路径。当村庄发展被卷入市场经济浪潮后,村庄的发展路径越发复杂化,城乡的要素流动和产业分工也可能是村庄研究、城乡融合发展研究在理论层面的焦点。

## [参 考 文 献]

- [1] 陈文胜. 大国村庄的进路[M]. 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
- [2] 习近平. 把乡村振兴战略作为新时代“三农”工作总抓手[J]. 社会主义论坛,2019(07):4—6.
- [3] 韩纪江. 什么样的村庄更容易空心化?——基于全国14省44县111个行政村的调查数据[J]. 江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0(06):83—90.
- [4] 李培林. 巨变:村落的终结——都市里的村庄研究[J]. 中国社会科学,2002(01):168—179.
- [5] 田毅鹏,韩丹. 城市化与“村落终结”[J]. 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1(02):11—17.
- [6] 李国珍. 村庄衰落的多维表现及有效治理:258个样本[J]. 改革,2013(05):88—96.
- [7] 陆益龙. 村庄会终结吗?——城镇化与中国村庄的现状与未来[J]. 学习与探索,2013(10):21—30.
- [8] 吴业苗. 乡村转型及其路向:基于“人的城镇化”发展逻辑[J]. 人文杂志,2017(08):116—124.
- [9] 刘鸿渊,蒲萧亦. 乡村振兴视角下的村庄异质化及其策略选择[J]. 经济体制改革,2020(03):73—79.
- [10] 马荟,庞欣,奚云霄,等. 熟人社会、村庄动员与内源式发展——以陕西省袁家村为例[J]. 中国农村观察,2020(03):28—41.
- [11] 郭占锋,李轶星,张森,等. 村庄市场共同体的形成与农村社区治理转型——基于陕西袁家村的考察[J]. 中国农村观察,2021(01):68—84.
- [12] 顾钰民,闫宇豪. 城镇化和工业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研究[J]. 河南社会科学,2017(07):35—40.
- [13] 王飞鹏,白卫国. 农业现代化、新型工业化与城镇化协调发展研究——基于中国1998—2015年三大经济地带的面板数据分析[J]. 兰州学刊,2018(05):200—208.
- [14] 娄钰华,张松林. 工业化、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路径——基于系统动力学仿真研究[J]. 学习与实践,2019(11):65—72.
- [15] 龚锐,谢黎,王亚飞. 农业高质量发展与新型城镇化的互动机理及实证检验[J]. 改革,2020(07):145—159.
- [16] 王丽娜,郭振. 论“四化”同步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J]. 学术交流,2021(02):100—110.
- [17] 冯海发. 农村城镇化发展探索[M]. 长春:吉林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5.
- [18] 折晓叶,陈婴婴. 超级村庄的基本特征及“中间”形态[J]. 社会学研究,1997(06):35—43.
- [19] 折晓叶. 村庄的再造:一个超级村庄的变迁[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20.
- [20] 郑风田,阮荣平,程郁. 村企关系的演变:从“村庄型公司”到“公司型村庄”[J]. 社会学研究,2012(01):52—77.
- [21] 何安华. 改革开放40年巨变:四川宝山村发展个案[J]. 农村经营管理,2018(12):32—33.
- [22] 陈晓燕. 资本下乡后的村企关系——基于产权政治视角的分析[J]. 山西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01):70—76.
- [23] 刘守英. 集体土地资本化与农村城市化——北京市郑各庄村调查[J].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06):123—132.
- [24] 毕普云. 农业形态理论建构与解构研究[J]. 世界农业,2018(05):31—35.

(责任编辑:蒋萍)

(下转第77页)